【心理学研究】

东亚国际婚姻移民女性遭受虐待的心理状况比较研究^①

尹靖水¹, 中嶋和夫², 全信子³

(1.日本梅花女子大学; 2.日本冈山县立大学; 3.延边大学人文学院, 吉林 延吉 133002)

[摘要]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际移民女性化已成为独特的潮流,尤以国际婚姻非常盛行。然而国际婚姻移民女性因家庭暴力和恐怖事件及贫穷引起的家庭破裂,处于恶劣的生活环境中。在此背景下,探讨国际婚姻移民女性遭受丈夫虐待的原因及其所带来的影响显得极为重要,可以为构筑和睦的多元文化家庭,提供政策性依据。

[关键词] 东亚;国际婚姻移民女性;遭受虐待;不满情绪;心理健康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450(2012)06-0127-05

一、绪论

在人口跨境迁移理论中,较为普遍使用的是推拉理论,它不仅仅是源于经济差异,更参杂着战争、政治纷争、家庭形成、人才流动等多种因素。以组成家庭^[1]为目的的移民大致有三类:1.家庭中有人先移民到其他国家之后,其他家庭成员为了家庭团聚而移民^[2]。2.男性移民到经济相对发达、劳动市场较为丰富的国家工作,男性出身国的年轻女性为与其结婚组成家庭而进行移民^[3]。3.出身国虽然不同,但男女双方为寻求配偶,移民到对方的出身国或第三国^[4]。这三种类型,时而同时进行,时而各自进行,各国均表现出不同特点。但近年来,在东亚圈(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第三种类型的国际婚姻移民女性正逐渐增多。但这些婚姻移民女性,由于家庭暴力或恐怖事件,以及因贫穷引起的家庭破裂等,处于恶劣的生活环境之中。尤其是在这些事件中,国际婚姻移民女性遭受丈夫虐待的事件较为普遍,但对其研究大都只停留在媒体的报道,学术性的研究寥寥无几^[5]。仅有的研究也只涉及关于事发频率的技术性统计或关于虐待内容,缺乏有关虐待的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一般而言,虐待的因果关系的实证

研究通常由虐待发生的原因及虐待所造成的影响等构成。如果以此具体分析国际婚姻移民女性的话,研究虐待发生的原因应主要聚焦在为何在多元文化家庭中妻子受丈夫的虐待;研究虐待造成的影响应包括:对伴侣怀有不满情绪、心理健康低下(忧郁倾向)、婚姻满意度低下、维持家庭意识低下、家庭解体、离婚和杀人等方面。

如把上述作为研究背景的话,我们可以把到目前为止几乎还没有涉及的多元文化家庭中的虐待问题,尤其是国际婚姻移民女性遭受丈夫虐待而产生的后果作为实证性研究课题。研究对伴侣怀有不满情绪和心理健康低下(忧郁倾向的增加)等现象的产生原因,为早期预防国际婚姻移民女性经常遭受丈夫虐待提供重要的依据。并通过韩国、日本和台湾的多元文化家庭的比较,为国际婚姻移民女性的出身国提供有益的信息。

因此,本研究为有效地预防多元文化家庭发生虐待和家庭解体做基础性的资料收集;同时以证明东亚国际婚姻移民女性遭受丈夫虐待、对丈夫的不满情绪以及心理健康问题的相互关联性为目的。

[收稿日期] 2012-09-10

[作者简介] 尹靖水(1958-)男,日本梅花女子大学教授,社会福祉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福祉学研究;中嶋和夫(1948-),男,日本冈山县立大学教授,医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福祉学研究;全信子(1957-),女,吉林敦化人,延边大学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跨民族文化研究。

^①本研究是以尹靖水、中嶋和夫、朴志先(日本冈山县立大学大学院保健福祉学研究科)、金贞淑(韩国庆尚南道女性能力开发中心)共同进行,由延边大学民族学硕士研究生孙菲参与翻译。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在韩国忠清南道的9个地区(4市5郡)从这些地区中随机选出1000名国际婚姻移民女性;日本九州地区的200名国际婚姻移民女性;台湾的台北市、高雄市、台北县和桃园县等四个地区的200名国际婚姻移民女性。问卷的发放工作由各管理机关的调查员担任,并与调查对象签订协议,保护其个人信息。

调查内容由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受虐待的妻子对丈夫的不满情绪和心理健康状况等构成。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由国际婚姻移民女性的实际年龄、结婚年龄、国籍、结婚途径、婚姻持续时间、丈夫的实际年龄和结婚年龄等几个方面构成。本调查全部由国际婚姻移民女性作答。

关于受虐待的妻子状况,主要以磋商、心理虐待、身体暴力、性压迫和伤害^[6]等五个方面进行研究,或由心理虐待、身体虐待和性虐待^[7]三方面构成。但是,由于相关身体虐待的情况很难得到准确的回答和判断,所以本研究排除身体虐待一项进行分析。关于本课题的研究者,临床经验是以与众多专家的采访调查为基础,以心理虐待、语言虐待、社会虐待、性虐待、经济虐待等五项内容构成,每项分四项,共20项。每项的回答分别为“从来没有过”、“很少有”、“经常有”,得分分别为“0分:从来没有过”、“1分:很少有/经常有”。“对丈夫是否有不满情绪”这一问题,以研究人员的采访经验为基础,以从中得出的四项内容进行测定。每项问题的答案分别为“0分:完全没有这样的感觉”、“1分:有些这样的感觉”、“2分:经常有这样的感觉”、“3分:这样的感觉非常多”。心理健康状况由调查工具GHQ-12(8)测定,由此测定的心理健康状况特定为‘1-1-0-0’9)方式,总得分越高,就意味着心理健康状况不好,再则,3分以上就意味着有忧郁倾向。

三、研究结果

(一) 研究对象的个人信息

回收的调查问卷数,韩国332名、日本151名、台湾174名。韩国、日本、台湾的研究对象个人信息,从国籍来看,韩国资料显示,多元文化家庭中妻子的实际年龄(有效作答:297名,89.5%)平均29.4岁(标准偏差6.71,范围19~52岁),丈夫的实际年龄(有效作答:320名,96.4%)平均42.6岁(标准偏差5.94,范围29~62岁)。结婚年龄,妻子(有效作答:208名,62.7%)平均26.9岁(标准偏差5.93,范围18~49岁),丈夫(有效作答:200名,60.2%)平均38.9岁(标准偏差6.98,范围19~57岁)。丈夫和妻子的年龄差(有效作答:184名,55.4%)平均13.1岁(标准偏差6.62,范围

-4~28岁),和丈夫的婚姻持续时间(有效作答:255名,76.8%)平均4.3年(标准偏差3.28,范围1个月~18年6个月)。妻子的国籍(有效作答:332名,100.0%),按照作答比率最高的顺序排名前3位的是,越南153名(46.1%)、菲律宾65名(19.6%)、中国64名(19.3%)。结婚途径的作答分布(有效作答:162名,93.1%),按照作答比率最高的顺序排名前3位的是,“通过商业性中介成婚”为143名(43.1%)、在韩国通过国际婚姻朋友的介绍结婚的59名(17.8%)、通过宗教团体介绍结婚的43名(13.0%)。

日本资料显示,多元文化家庭中妻子的实际年龄(有效作答:126名,96.2%)平均40.0岁(标准偏差8.28,范围20~63岁),丈夫的实际年龄(有效作答:127名,96.9%)平均50.0岁(标准偏差8.16,范围33~70岁)。结婚年龄,妻子(有效作答:122名,93.1%)平均29.3岁(标准偏差6.78,范围18~52岁),丈夫(有效作答:119名,90.8%)平均39.3岁(标准偏差9.65,范围21~65岁)。丈夫和妻子的年龄差(有效作答:119名,92.1%)平均10.5岁(标准偏差8.87,范围11~35岁),和丈夫的婚姻持续时间(有效作答:127名,96.9%)平均10.9年(标准偏差7.05,范围2个月~36年6个月)。妻子的国籍(有效作答:150名,99.3%)按照作答比率最高的顺序排名前3位的是,菲律宾98名(64.9%)、韩国23名(15.2%)、中国21名(13.9%)。结婚途径的作答分布(有效作答:129名,98.5%)按照作答比率最高的顺序排名前3位的是,以外国打工者身份在日本滞留并恋爱结婚的59名(45.0%)、其他31名(22.1%)、在日本通过国际婚姻的朋友介绍结婚的15名(11.5%)。

台湾资料显示,多元文化家庭中妻子的实际年龄(有效作答:170名,97.7%)平均33.5岁(标准偏差7.04,范围22~60岁),丈夫的实际年龄(有效作答:171名,98.3%)平均44.8岁(标准偏差9.70,范围27~83岁)。结婚年龄,妻子(有效作答:168名,96.6%)平均26.8岁(标准偏差6.30,范围15~55岁),丈夫(有效作答:168名,96.6%)平均38.0岁(标准偏差9.62,范围22~82岁)。丈夫和妻子的年龄差(有效作答:167名,96.0%)平均11.4岁(标准偏差8.00,范围16~34岁)。和丈夫的婚姻持续时间(有效作答:173名,99.4%)平均7.6年(标准偏差4.70,范围1个月~35年2个月)。妻子的国籍(有效作答:174名,100.0%),按照作答比率最高的顺序排名前3位的是,越南67名(38.5%)、中国大陆39名(22.4%)、印度尼西亚38名(21.8%)。结婚途径的作答分布(有效作答:162名,93.1%)按照作答比率最高的顺序排名前3位的是,通

过商业性中介成婚的40名(23.0%)、其他为40名(23.0%)、通过在台湾工作的家人、亲戚介绍结婚的35名(20.1%)、在台湾通过国际婚姻的朋友介绍结婚的26名(14.9%)。

(二) 各测定尺度的合适性和可信度检测结果

回收的问卷中关于虐待妻子、妻子对丈夫的不满情绪和心理健康状况等问题的回答,所采用的数据来自韩国180人、日本91人、台湾138人所作的回答。其内容的结构模型数据的合理性,及所有的途径系数,从统计学角度来讲达到了有效水准。

1. 虐待妻子

受虐待的妻子作答,韩国的资料显示,虐待妻子的原因结构模型数据合理性是CFI为0.998, RMSEA为0.032,所有的途径系数从统计学角度来讲达到了有效水准。KR-20可信度系数方面,“心理性虐待”为0.868、“语言性虐待”为0.784、“社会性虐待”为0.860、“性虐待”为0.813、“经济性虐待”为0.738。

日本的资料显示,虐待妻子的原因结构模型数据的合理性CFI为1.000, RMSEA为0.000,所有的途径系数从统计学角度来讲达到了有效水准。KR-20可信度系数方面,“心理性虐待”为0.783、“语言性虐待”为0.717、“社会性虐待”为0.751、“性虐待”为0.741、“经济性虐待”为0.698。

台湾的资料显示,虐待妻子的原因结构模型数据的合理性是CFI为0.976, RMSEA为0.067,所有的途径系数从统计学角度来讲达到了有效水准。KR-20可信度系数方面,“心理性虐待”为0.877、“语言性虐待”为0.807、“社会性虐待”为0.817、“性虐待”为0.537、“经济性虐待”为0.766。

2. 妻子对丈夫的不满情绪

妻子对丈夫的不满情绪作答结果,韩国、日本、台湾的模型数据合理性是CFI为1.000, RMSEA为0.001, Cronbach's α 可信度系数韩国为0.848、日本为0.813、台湾为0.856。

3. 心理健康状况

假定以心理健康状况为一内容模型,确认模型数据合理性,从统计学角度来讲,下面数据都在容许范围之内,所有的途径系数达到了有效水准。所得的结果:韩国的资料显示CFI是0.954, RMSEA是0.108, KR-20可信度系数为0.844。并且,心理健康状况的总得分为平均3.6分(标准偏差3.20),而得分超过3分则被认为有忧郁倾向,据此,研究对象中有92人(51.1%)有忧郁倾向。日本资料显示CFI是0.951, RMSEA是0.102, KR-20可信度系数为0.844。心理健康状况的总得分平均2.2分(标准偏差2.80),研究对

象中有28人(30.8%)有忧郁倾向。台湾资料显示CFI是0.936, RMSEA是0.084, KR-20可信度系数为0.844。并且,心理健康状况的总得分平均3.7分(标准偏差2.96),研究对象中有82人(59.4%)有忧郁倾向。

(三) 受虐待的妻子对丈夫的不满情绪和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据假定的因果关系模型数据的合理性显示,韩国的CFI是0.956, RMSEA是0.064的数据为合理数据。途径系数方面,在“心理性虐待”和“社会性虐待”中,趋于对丈夫的不满情绪的途径系数分别为0.295、0.465,从统计学角度来讲,达到了有效水准。同时,在对丈夫的不满情绪中,趋于心理健康状况的途径系数为0.255(比率6.5%)。

日本的资料显示CFI是0.918, RMSEA是0.106的数据,为合理数据。途径系数方面,在“心理性虐待”中,趋于对丈夫的不满情绪的途径系数为0.520,从统计学角度来讲达到了有效水准。同时,在对丈夫的不满情绪中,趋于心理健康状况的途径系数为0.697(比率48.6%)。

台湾的资料显示CFI是0.909, RMSEA是0.078的数据为合理数据。途径系数方面,在“性虐待”中,趋于对丈夫的不满情绪的途径系数为0.294,从统计学角度来讲达到了有效水准。同时,在对丈夫的不满情绪中,趋于心理健康状况的途径系数为0.403(比率16.2%)。

四、考察

本文关于虐待妻子的研究,主要从虐待发生的原因和虐待造成的影响两个层面上进行考察。本研究针对目前为止,几乎没有研究过的国际婚姻移民女性经常遭受丈夫的虐待和这种虐待对当事人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探讨。

提高多元文化家庭的福利待遇是目前国际移民社会的重要课题。提高多元文化家庭的福利不仅需要居民意识的变革,而且也需要相关专家参与多元文化家庭所面临的日常生活问题。因此,本研究以收集有关多元文化家庭的家庭暴力和有关预防家庭虐待的基础资料,以力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对多元文化家庭中妻子遭受丈夫的虐待和妻子对丈夫的不满情绪,以及妻子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相关的实证性探讨。

目前有关国际婚姻移民女性受虐待和家庭暴力的研究,都是以劳动移民女性^[9]移民第一代的妻子^[10]和国际婚姻移民女性为对象而进行的。这些研究都是以相同的研究方法进行事例分析和采访调查。但是,对于研究对象正在遭受何种虐待、虐待程度如何以及发生这些虐待的原因和结果的相关研究并未深入。因

此,本研究最大限度地扩大对来自多元文化家庭遭受多重虐待的妻子,因遭受丈夫的经常虐待而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此时,作为影响因素,与终结点相适应的家庭解体及离婚、杀人事件的内容,虽然是相对独立概念(变数),但在终结点上处于危险因素的,即对丈夫的不满情绪的压抑认知和忧郁症状等都可分类为压抑反应。同时,本研究还关注了对后代的影响问题。在妻子对丈夫的不满情绪问题上,以研究者的临床经验为基础设计了内容。其结果对丈夫的不满情绪内容模型数据较为合理。在虐待妻子方面,妻子遭受丈夫虐待的频度上,主要由心理性虐待、语言性虐待、社会性虐待、性虐待、经济性虐待等五个方面构成。这些虐待内容的原因结构模型是以目前的研究成果为基础^[11],此原因模型数据合理,并且在原因的结构方面,从统计学上支持构成概念的合适性。在心理健康状况方面,目前韩国、日本和台湾都经常使用GHQ-12对其进行研究,此原因模型数据合理。

以上述结论为基础,用GHQ-12测得的心理健康状况为应变数,据此得出,作为首次原因是对丈夫的不满情绪,作为第二次原因,从5个方面虐待妻子的间接模型数据合理性的探讨结果,最终根据假定的因果模型数据,韩国、日本和台湾的数据资料显示基本合理。即作为潜在压抑的原因丈夫的虐待,给压抑认知的妻子对丈夫的不满情绪造成了影响,并给压抑反应的GHQ-12测得的心理健康状况造成了影响。但是,妻子经常遭受虐待与妻子对丈夫的不满情绪有关,所以在韩国,妻子遭受心理虐待和社会虐待的频率,趋于对丈夫的不满情绪的途径系数,从统计学角度上达到了有效水准;而在日本的心理虐待和在台湾的性虐待,趋于对丈夫的不满情绪的途径系数,从统计学角度上也达到了有效水准。但是,从韩国、日本和台湾所得到的数据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考虑由五个方面构成是合理模型的话,则可以得出,虐待并非单独发生,其发生具有相互关联性。据此,本研究所采用的Lazarus的压抑认知理论^[12]可以通过假设来对其进行验证。

再则,妻子对丈夫的不满情绪和妻子心理健康状况的比率为:韩国是7.1%、日本是48.6%、台湾是15.5%。据此可看出,韩国的数值与日本、台湾的数值相比,明显偏低,这并不是说韩国的国际婚姻移民女性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受丈夫虐待的影响,而是还有其他的影响因素对其发生作用。特别是把着眼点放在心理健康方面,具有忧郁倾向的国际婚姻移民女性的比率,韩国是51.1%、日本是30.8%、台湾是59.4%;从这一点上看,在韩国和台湾尽早发现或阐明与心理健康

状况相关的原因是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如果以压抑认知理论为基础进行分析的话,可以发现与心理健康状况相关的因素,不只有本研究中使用的对丈夫的不满情绪,还包括和公公婆婆的关系、文化适应问题、相互沟通问题和经济压迫感等,它们彼此之间复杂地交互作用。因此,应该尽快开发与这些因素相关的测定尺度,并把这些因素作为独立变数的因果关系模型进行实证性研究。参考现存的研究结果^[13]可以发现,由于压抑认知而造成对方虐待行为发生的危险是相当高的。换言之,也不能否认夫妇经常经受的负面性压抑认知是导致多元文化家庭内虐待恶性循环发生的原因。因此,进行与虐待有关的因果关系模型的实证性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如果以本研究的结论为基础,做政策性和临床性提案的话,关于早期预防妻子经常遭受丈夫虐待的必要性和对此问题的解决方法,都有助于延续家庭的持续和婚姻满足感的提高。但是,这种预防性参与做起来并不简单。例如,即使存在是否虐待和被虐待的判断标准,也不能否认多元文化家庭的夫妇和专家之间,对这个标准的认定可能存在着差异。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专家来说,说的极端一点,把虐待深化为一种犯罪行为的认知;同时对多元文化家庭夫妇来讲,需要对虐待行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参与。再则,举例说明,在多种压抑因素导致虐待情况发生时,需要专家个人应如何对应、参与计划的技术。虽然开发了许多关于支援多元文化家庭的政策,但是对于政策的有效性却没有进行科学的解释和说明。在这种状况下,韩国国会于2002年11月提出了“关于处罚家庭暴力犯罪等的特例法”(以下简称特例法)的修订法案。其实韩国早在1983年就设立了民间女性团体“女性之电话”,并最早在国内进行了有关家庭暴力的调查、开设会馆等,对家庭暴力问题正式开始研究。此后,长时间遭受虐待的妻子杀害丈夫的事件发生后,“女性之电话”等女性团体持续开展活动,要求对被告进行减刑,同时积极开展促进“防止家庭暴力法”的制定运动。通过这样的努力,对家庭暴力的加害者实施刑事处罚的特例法和制定防止家庭暴力及有关受害者的福利政策,即“关于防止家庭暴力和保护受害者等的法规”(以下简称保护法)终于在1997年12月正式出台,并从1998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但是,以这种保护法为基础开展工作的全国家庭暴力热线访谈件数,在法律制定后反而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并且,不仅案件的数量增加,而且还出现了用刀刺、勒脖子和开空气枪等恶性家庭暴力事件,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于是2002年在法律的修订中,关于受害者的保护问题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问题。此次修订,

主要是 1.法律的目标 2.应急措施 3.违反“家庭暴力的实施者禁止靠近受害者”等临时措施时的措施 4.对发生家庭暴力的家庭的儿童教育负责人等进行保密; 5.修改保护处罚等相关的检查请求权的规定。尤其是根据修改三的第 8 项, 检察可以向法院提出执行类似“即使有制止暴力行为的应急措施, 如有再发生家庭暴力倾向的家庭暴力者, 不得靠近受害者居住地 100 米以内”等临时措施。但是对于如果发生家庭暴力者违反此类临时措施的情况该如何处理的问题上, 并未加以规定。据此, 修订将目前的第 8 条作为第 8 条的第 1 项加以实行, 而对于违反新的临时措施的家庭暴力者, 则追加第 2 项和第 3 项规定予以惩罚。例如, 如果家庭暴力者违反临时措施的话, 则可以通过享有检察权力的司法警察的申请向法院提出请求, 对有再度发生家庭暴力危险的家庭暴力者进行拘留。(第 8 条, 第 2 项)并且在 2003 年 2 月, 韩国警察厅向各警察局发布了“处理家庭暴力事件的警察专用手册”, 宣布实行“以后再有家庭暴力的情况发生, 即使屋主人不开门, 警察也有强行进入屋内的公务权力”等一系列的积极介入的方针。这些内容不仅为多元文化家庭的丈夫, 而且翻译成妻子的母语, 为她们提供情报, 这一点很重要。

虽然, 在本研究中虐待妻子和妻子对丈夫的不满情绪息息相关, 但是为了回避这种消极的压抑, 即换个角度来讲, 也无法否认妻子对丈夫实施虐待的这种可能性。为了预先防止这种虐待恶性循环的发生, 以多元文化家庭夫妇为对象, 对其进行教育并提供信息的项目及为确保被虐待者的安全而制定的方案, 有必要以具体模式向人们提供信息。并且, 开发能够掌握虐待危险性高的家庭尺度也是非常必要的。

如上所述, 本研究以东亚国际婚姻移民女性为对象, 用以 GHQ-12 测得的心理健康状况(压抑反应)为应变数, 据此得出的第一原因为对丈夫的不满情绪(压抑认知), 其次原因为虐待妻子(潜在压抑因素)的间接模型, 在统计学上得以明确支持。本研究验证出韩国的“心理性虐待”和“社会性虐待”与对丈夫的不满情绪密切相关; 而且, 日本的“心理性虐待”和台湾的“性虐待”也与对丈夫的不满情绪有关。在本研究中, 构成虐待妻子的五个假设因素, 相互之间密切相关, 从实证性角度上得到 Lazarus 压抑认知理论的支持。此研究的成果可以显示, 对于东亚的多元文化家庭来说, 有

必要构筑政策性和实践性预防虐待的政策, 以根据资料分析做成的研究, 进行持续性的追踪。

[参考文献]

- [1]Ishii Kayoko Theoretical Review.Cross-border Migration as Reproduction Labour- [J].NUCB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004,49(2): 397- 409.
- [2]Kafman E. Female ‘Birds of Passage’ a Decade Later.Gender and Immigr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99,33(2):269- 299.
- [3]Ko-Li Chin Out-of-town brides, international marriage and wife abuse among Chinese immigrants[J].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1994(25) 53- 70.
- [4]Truong T-d.Gender,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implications for theory, policy, research and networking[J]. Asian Pac Migr J, 1996 5(1): 27- 52.
- [5]Tan J. & Davidson G. Filipina-Australian marriage.Further perspective on spousal violence [J]. Australia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994 29(3): 265- 282.
- [6]Straus MA., Hamby SL., Boney-McCoy S. & Sugarman DB.The Revised Conflict Tactics Scales(CTS2)[J].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996 17(3): 283- 316.
- [7]Kim Oh-Nam Study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Abuse of Immigrant Women [J]. Korean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006 58 (4): 5- 35.
- [8]Goldberg DP & Hiller VF A scaled version of the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J]. Psychological Medicine,1979(9) :139- 145.
- [9]Shah ID. & Menon I Violence Against Women Migrant Workers: Issues, Date, and Partial Solutions[J].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1997 6(2):5- 30.
- [10]Easteal P Violence Against Immigrant Women in the Home[J]. Family Matters,1966(45) 26- 30.
- [11]桐野匡史,矢嶋裕树,柳汉守,等.高龄者看护者的负担感与心理虐待的关系[J]. 厚生的指标, 2005 52(3): 1- 8.
- [12]Lazarus RS & Folkman S Transactional theory and research on emotions and coping[J].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87(1) : 141- 169.
- [13]唐轶斐, 矢嶋裕树, 桐野匡史, 等.关于不适合育儿行动倾向的测定[J]. 日本保健科学学会志, 2005 7(4) 269- 276.

【责任编辑 詹 丽】